

# 垃圾投放的权利与交易：一项观念史研究

李锦峰

垃圾投放权是人类的发明,是社会的历史创造。它不源于上帝的意志,也不源于自然的想象。相反,它是人们在同疾病、肮脏、邪恶的斗争中形成的,恰恰是与宗教的约束、与自然的力量相对抗的结果。

工业化真正让垃圾成为城市治理的难题,不仅因为垃圾的性质发生了根本变化,还因为无限的增长需求带来了无限的消费,而消费主义几乎就是垃圾激增的同义语。与此同时,工业化也为人们带来了卫生观念和环保观念。此后,垃圾投放不再是一个单纯的城市治理问题,更是一个生存斗争的对象,而生存斗争的进一步就是对个体发展及其条件的要求。

正是卫生和环保的观念,让垃圾投放从一个操作性问题,变成了文化和精神上的要求。对不规范的垃圾投放付费,是过去惩罚方式的文明化;对正常的垃圾投放付费,是影

响公共健康和公共环境需要付出的代价。但是,人们显然不满足于这种垃圾治理的消极解释,积极的权利观念因此应运而生。在“多扔多付”的体系中,人们购买的是垃圾投放权,看起来是一种交易机制,实质上是争取个体发展的制度安排。

## 质变:恶化的根源

垃圾曾经是大自然的一部分,是生态循环的一个环节,甚至没有什么垃圾不垃圾的区分。即便是城市化也没有改变太多,它只是让这些自然的活

动集中,让自然的进化局促了而已。让大规模城市化成为问题的是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和消费主义的盛行。

事实上,工业革命的兴起,与城市卫生状况明显恶化同步出现,造成了“世界上迄今为止最糟糕的城市环境”。(刘易斯·芒福德《城市发展史》)

消费时代加剧了这一个过程。一旦生产是为了获取利润、为了推动资本增值,物品的使用价值就越来越从主要需求变为次要需求,使用本身也越来越无关紧要。一旦生产与消费分离,生产到消费的距离被拉长,中间的流通环节越多,产生的垃圾也就越多。这就解

释了垃圾构成的变化,各种包装物,在垃圾总量中占三分之一还要多。同时也解释了另一个问题:为什么对卫生的要求越高,产生的垃圾反而越多。尤其是食品方面,大量的、复合的、多层的包装用来保障食品安全,减量变质可能、防止二次污染、方便运输拿取等等。

## 卫生:整洁的蜕变

16世纪,葡萄牙多明我修士克路士(Gaspar da Cruz)来到广州、福州等城市,看到无论城郊还是市区,街道都铺设良好,

整齐而笔直,两边高中间低,便于排水(克路士《中国志》)。17世纪,罗马尼亚人米列斯库(N. Sputaru Milesco),在《中国漫记》里也记录了同样的道路状况,并认为这是“中国最使外国旅行者惊叹不已”的地方。

国家参与垃圾投放的管理,早在《韩非子》已经有“殷之法,弃灰于道者断其手”的记载。北宋曾经设置“街道司”,专门负责开封街道的修治,积水疏导;打扫洒水,保持整洁;巡视,管理交通。街道司“以五百人为定额”,多由“兵士”充当(徐松《宋会要辑稿》)。国家法

(下转12版) ➔

◀ (上接10版)

波助澜。一些右翼专家如格伦·贝克尔(Glenn Becker)考虑到大学生在学识上不符合进行研究的的标准,甚至敦促大学生不要去参加“名称含有‘研究’两字”的课程,因为这两字已经被用滥了。事实上,包括“区域研究”在内的“研究”项目已经经历了重组和颠覆的过程。俗话说:“老的东西是新的,新的东西也是老的”。

同时,东方学对自身的颠覆也正在进行中。毫无疑问,爱德华·萨义德对东方学的批评对我们的工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是,由于萨义德只关注英国与法国的东方学研究,而忽略了德国的东方学研究,因此其论点仍存有争议。这是因为德国东方学与英国和法国东方学之间有着很多细微差别,而这些都必须被区别和加以评判。

我自己的研究为这场对话提供了一个例证: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长期以来德国学者“垄断”了对伊斯兰世界,特别是埃及的皮影戏的研究。我的研究表明,德国东方学界对埃及皮影戏所做的开创性工作是具有积极意义的,而且这些德国学者的动机和方法并不符合萨义德对“东方学”的刻板印象。事实上,最近有关德国东方学的新出版物激增,且其观点和视角非常有趣。所以此事尚未盖棺定论。

文汇报:在阿拉伯文化研究内部,因为使用语言的不同还可以细分为阿拉伯语、波斯语、突厥语三大部分,而蒙古帝国时期这三部分之间交流的密切程度超越以往,达到高峰。因此阿拉伯语(马穆鲁克史),波斯语和突厥语研究者之间经常需要参考彼此的研究成果。不过根据我个人的印象,原先这三部分的研究往往恪守自己研究的领域(如《剑桥伊朗史》的编写者Boyle, Lambton等人在研究中利用的主要仍是波斯语文献)。不过近20年来,各个领域之间的界限有逐渐模糊的趋势,如芝加哥大学约翰·伍兹(John Woods)门下的年轻学者(J. Pfeiffer, S. N. Yildiz等)在研究中均能同时使用上述两种甚至三种语言的文献;而在日本学界较年轻的一批学者中,也能观察到这个趋势。您和芝加哥大学这批学者很熟悉,请问您是如何看待和评价这一趋势的?这是否意味着对今后要进入这一领域的博士生,在语言训练和学术视野上会提出更高的要求?

郭黎: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事实上,如果我们读一下早期东方学家的自传,尤其是奥地利和德国的东方学家,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已经掌握了三门语言。法语和英语东方学界的情况稍有不同,他们更愿意去掌握阿拉伯语和波斯语。无论如何,东方学者基本都具有以至少两门语言(如果不是三门)进行工作的能力。人们可能

会觉得有趣的是,极负盛名的阿拉伯文学史著作的作者,R. A.尼科尔森在剑桥大学担任波斯文学学会的主席。这种对多语种能力的重视也反映在传统近东语言与文明系的要求中。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学科重点和优先事项逐渐转移至其他方面。在一流项目中,对多语种的要求可能在默认情况下仍保持不变,(人们经常开玩笑说近东语言与文明系的课程至少有一百年的历史了),但该要求执行的力度各不相同。

在我看来有两点要做:

第一,语言习得与定期的集中训练有关。鉴于中东地区长期以来的各族裔和各语言共存且互相影响,因而多种语言(和某一语系或语支)占据了突出且具主导性的地位。因此,研究早期伊斯兰教的学生应该掌握一些闪族语言的知识,尤其是叙利亚语(阿拉米语)。对于研究早期的伊斯兰化的埃及,犹太-阿拉伯和科普特语则极为合适。对于研究古典伊斯兰教的学生来说,波斯语非常重要,因为“波斯化”(Persianate,此处使用了马歇尔·霍奇森[Marshall Hodgson]的术语)在塑造伊斯兰知识遗产方面发挥了作用。至于研究之后的“后古典”时期的话,即马穆鲁克、伊利汗国与蒙古时代,必须再加上土耳其语,正如你所指出的那样。毋庸置疑,在阿拉伯文化研究领域,阿拉伯语仍然处于中心位置,

而且是必不可少的。

第二,就对培养研究13至16世纪中东历史的研究生而言,最佳做法是在所有三种与阿拉伯世界历史相关的主要语言教学水平较高的学校开展相关培养项目。在这方面,我必须说普林斯顿大学和芝加哥大学是其中最为出类拔萃的,这要归功于他们在阿拉伯语、波斯语和土耳其语这三门语言的高质量教学水平:不仅有大批熟悉每种语言的专家(芝加哥大学拥有三位波斯语正教授),而且也有许多教员自己掌握多语种材料。反过来,教师的水平也会影响研究生的训练。

以你提到的朱迪思(Judith Pfeiffer)和莎拉(Sara Yuldiz)为例,当我在1990年代中期在芝加哥大学认识她们的时候,她们正与研究帖木儿帝国和中亚的历史学家约翰·伍兹以及卓越的奥斯曼历史学家,“麦克阿瑟天才”奖获得者康奈尔·弗莱舍尔(Cornell Fleisher)。

在美国学术界有一种说法,有两种美国青年在研究中东:石油公司高管与外交官的儿子以及传教士和犹太人。伍兹和弗莱舍尔也是如此,他们分别是石油公司高管和外交官的儿子,他们在中东待过很长一段时间,并由此习得了语言技能——伍兹是在伊朗,而弗莱舍尔是在埃及和土耳其。之后他们进入普林斯顿大学读书,而普林斯顿大学除了阿拉伯语之外,对于波斯语与土耳

其语的教学研究也有自己的悠久传统。这两个人都能很流利地使用两种或三种语言交流或工作(弗莱舍尔在任职于芝加哥大学前曾在俄亥俄州立大学教授阿拉伯语),而他们的许多学生都跟随着导师的步伐。朱迪思和莎拉是目前各自领域内冉冉升起的学术新星,两人都正在做一些尖端的研究。若没有必要的语言技能作为工具,要做到这些是不可想象的。

你的观点很正确,因为未来专攻13至16世纪中东和中亚历史的研究生的培养,至少需要通晓两门语言(理想状态下是三门)并能够用它们进行工作,这是获得优势的关键。当然,像普林斯顿大学和芝加哥大学那样,“奢侈”地聘用由各种语言的顶尖专家组成的豪华阵容来培养学生,只有少数一流大学才能做到。但对于有抱负的学生,通过其他方式学习语言也是一种明智的做法。(翻译/上海外国语大学胡甄卿) ■



珐琅制镀金瓶,13世纪